秦皇汉武的“八主”祭祀

从考古遗迹看思想史的问题：读《八主祭祀研究》

罗丰

秦始皇谋求建立一个崭新的帝国，在许多方面形成与周天子完全不同的统治方式。他亲自巡视全国，其中东方巡狩完全带有威慑性，即向被征服地区民众、神灵宣示征服。尽归于齐域的八主祠祭祀的地位显然在名山大川之上，秦始皇开始的皇帝祭祀虽然表面上提升了八主祠的地位，但实际上却是由皇帝垄断与上天的交通渠道。

随着考古事业的长足进步，过去学术界不便讨论的问题尤其是与古代思想有关的内容，现在有了重要的进展。从思想史的脉络来分析，一些原本不太清晰的古代中国信仰行为，在考古材料新发现的鼓励下成绩斐然。祭祀及有关事物如祖庙、牌位、礼器等作为氏族凝聚的象征；占卜询问的对象是久别的祖先，卜者扮演王与神的沟通中介；巫与神祇、祖灵等仪式，张光直都有讨论；郭店楚简、马王堆帛画和汉墓壁画的发现，使历史上原本已经失传的“太一生水”“太一出行”等重要概念获得新生。这些关怀的改变，一方面有赖于考古新发现，另一方面也与研究者兴趣有密切的关联。有些问题虽然重要而有趣，但研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一本以研究早已逝去多年并且为人罕闻的八主祠考古专著问世。

这部名为《八主祭祀研究》的考古研究专著，无论从田野调查的角度，还是解释考古材料的立场来说，都是一部有重要贡献的著作。自从著名学者李零先生关注古代山川祭祀以来，他极力推动相关学者对已知或未知的考古遗址进行调查研究，这本著作也是李零推动下的成果之一。本书的主编之一王睿关于八主祭祀研究一般性的看法和总结，已经在同名博士论文和文章中得以呈现，现在这部著作显然是这一主题的延续。本书所包含的内容除去李零撰写的一篇精彩的导论外，共有十部分的内容，前一章是绪论，其后八部分是对所谓的“八主祠”的实地田野调查和发掘，最后一章是结论。在田野考古工作的基础上作者采用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对秦汉文献中所记载的天、地、兵、阴、阳、月、日及四时等所谓的“八主”或“八神”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研究，因此这是一部由古代文献中宇宙观概念导入的关于祭祀遗址的考古学著作。

所谓的“八主”或“八神”的概念，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祭祀地点分布在今天的山东半岛。虽然它在秦汉国家祭祀体系中属于较重要的一类，是由皇帝亲自主导的中央祭祀活动，但是由于地处遥远，并不能像京郊太常祭祀那样每年举行。因此，《史记·封禅书》称：皇帝驾临则祭祀，皇帝不至则不祀，这样遗址的规模亦有不确定性。文献记录中亲临八主祠祭祀的秦汉帝王有秦始皇、秦二世、汉武帝和汉宣帝，西汉成帝时八主祠祭祀才从国家祭祀体系中被裁撤。本书的主要内容大约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八主祠所在位置的调查或发掘

自从八主祭祀从国家祀典中废除以后，祭祀地点的主祠逐渐被人们遗忘，后世八主祭祀地点多有衍变，甚至祭祀内容也众说纷纭。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利用文献线索，结合出土文物，先后对山东半岛的有关八主祠可能存在的地点进行大规模的考古调查。经过近四十年来几代人的努力，目下大体搞清楚了其中一些主祠遗址的所在位置。

天主祠大约在临淄故城南。城南牛山脚下原来有所谓天齐渊，泉水涌出如天之腹脐，喻为天下的中心，因以为祭，称“天齐”，原址已经被破坏殆尽。所谓八主的每个祭祀地点都与城邑或居邑有关联，临淄故城为齐之都城，有大小两城，大城建城不晚于西周中期，小城建于战国时期，过去出土的建筑材料中有“天齐”铭文瓦当。与封禅仪有密切关联的地主祠，调查时虽未能找到具体与之相匹配的祠祀地点，但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调查、试掘材料分析，应在泰山东南的梁父城附近。梁父城建于西汉时期，东汉废弃。

兵主祠，主祭蚩尤，由于其所在的鲁西地区属黄河肆虐之地，早期遗址现已无迹可寻。现代的重建明显出于附会的需要，在古代遗址上大兴土木，不过足使当代的复建更具说服力。

阴主祠，所在的莱州三山是孤立于海岸的三座小山，地理环境不适于人居，地面上只采集到东周至北朝时期的遗物，祠祀遗迹不存。

阳主祠位于烟台市东的芝罘岛上，由于条件所限，祠祀遗址未能进一步开展工作。现尚存清代阳主庙的戏台等部分建筑，在大殿前曾出土过两组祭祀玉器。在芝罘岛大疃村山前沿海台地上，西北距玉器出土地点 700 米处发现东西长 150 米，南北宽 40 米的汉代遗址，遗物有汉代半瓦当、铺地砖等建筑材料和陶器等，瓦当、铺地砖等建筑材料非一般民居所用，应该属于阳主祠的相关建筑。

调查者对保存情况尚好的月主、日主祠祀遗址进行了细密的调查和发掘工作，得到了秦汉时期祠祀遗址相对完整的布局和组合形式。

月主祠所在地是归城，归城为当地莱人都城，始建年代不会早于西周中期，在莱国灭亡后还作为城邑使用，下限可能要晚到战国时期。月主祠位于龙口市归城外城内的莱山半山腰处，战国时期就存在建筑，西汉中期的建筑规模宏大，应属于较高等级。东汉至唐代多复修缮，现存石墙等建筑遗迹属于唐代。庙周家村的夯土台基上曾建有用于登临的亭台建筑，从遗物上可分出秦、西汉两个时代。建筑遗迹附近窑址烧制器物，与建筑遗迹使用材料形制相同，建筑材料或为当地烧造。

威海荣成市成山头为岩石壁立的海岬，曾出土商末周初和战国时期一些器物残片，可能为早期祭祀的遗留。秦汉时期建筑规模扩大，各类建筑错落有致、鳞次栉比。遗址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仍能从残迹中略看出功能不同的组合，包括亭（观）、立石、祠庙、施祭地点等。

推测为齐祭天处建筑所用之瓦的“天齐”

图片出自王睿、林仙庭、聂政主编《八主祭祀研究》（文物出版社，2020 年 5 月）

四时主祠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的琅琊台，经历年调查和研究发现，祠祀遗址由大小两个夯土台构成，参照阳主、月主、日主祠的遗址组合形式，琅琊台大台可能为祠庙和皇帝驻跸之所，小台最有可能临近祭祀地。经考古调查，大台的使用年代历经了秦、西汉早期、西汉中晚期等多个时期。另外，琅琊台西北的祝家庄遗址出土了“千秋万岁”瓦当、陶水管等建筑材料，器物的形制、纹饰与琅琊台出土的西汉中晚期器物相同，遗址周围还分布有西汉中晚期大型高等级墓葬，祝家庄遗址有可能为琅琊郡址，或为汉宣帝的驻跸之所。

另外，在临淄故城内在刘家寨发掘出土的封泥中有“齐祠祀印”，显然是官方设立专门祭祀机构的有力证据。

八主祠所置祭祀时间的推定

关于八主祠所置的年代，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已经说：“其祀绝，莫知其起时。”所在的各个地点，战国晚期前均是异国所属，莱国于春秋晚期被齐所灭，阴主、月主、日主等祠祀才尽入齐的势力范围。泰山附近原本是鲁国的地域，齐人拥有则更晚。阳主所属纪国也是在齐灭之后纳入，鲁庄公四年（公元前 690 年），齐襄公伐纪，纪国灭亡。四时主祠在今黄岛区（原胶南市）琅琊台，曾属莒国，八主置时不一，很难确定。

直到齐国扩张到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时，八主的八个祠祀地点才尽归于齐域。原来分属不同诸侯国的各类神祇，这时才被齐国整合为八主祭祀。司马迁历数八神时，即以原来齐地为中心来叙述方位，所谓“齐地八神”的概念应该是战国晚期才形成的，这样八主祭祀的区域可分为泰山附近和胶东半岛。

中国早期的祭祀或与神灵、鬼神有关，甲骨文中祭祀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有关鬼神和神灵，向它们提出卜问，以求平安。春秋时期所谓礼崩乐坏，和上天沟通的方式已经发生变化，原有的系统已经无人能操作，才有孔子所谓礼失求诸野的局面。有关宇宙问题的思维理路及核心也发生了变化。战国时期在诸侯兼并的态势下，以求自保和发展的各国诸侯渴求人才，由此发展起来的诸子学说呈融合之势，其指向无一不是治国方略，正所谓“百家殊业，皆务于治”。《管子》《吕氏春秋》《周礼》等可以说是学术思想转化为意识形态的代表作，以秉持的学术政治思想为基础构拟新型社会制度。八主祭祀虽然未能指认具体的创立者，但大致属于齐国稷下学宫中的黄老学派。司马迁将稷下学宫归结于一位事迹十分模糊的齐人邹衍，邹衍是稷下学宫重要成员，在诸侯中非常受欢迎。他所使用的“五德”术语即与“五行”相似，很明显包括一些物质元素。他们不认同神创宇宙，宇宙观与金、木、水、火、土等元素联系起来，实际是自然观，有很深的阴阳思想。

由考古材料所得推衍出八主祭祀体系

中国的祭祀体系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祖先血缘系统；二是天地诸神。八主祭祀体系从本质上来说，不同于中国传统上至为重要的人神系统的祖先崇拜，亦非单纯的某个自然神。它是东方思想家在经历了血缘分封制毁坏崩塌的离变之痛后，对于人、人所依赖的自然环境以及人在自然环境中的地位所创造的神明体系。战国时期，血缘纽带关系变得薄弱，诸侯国间攻伐不止，灭国灭宗事件屡有发生，周天子只能维持其表面的“天下共主”的象征意义。面对靠血缘关系维持的和谐与秩序坍塌的社会现实，思想界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祖先祭祀之外寻求新的宗教支持。八主祠祀地点的选择是利用各地原有神祠来对应八主的祭祀对象，地点的方位分配也暗含着阴阳的划分。秦在血缘上并非周的“亲戚”之国，是由军功被封分，最初只被封为地位较低的大夫，勤王有功后才被迫封为诸侯，政权基础是论功行赏而非以血亲为基础的世卿世禄。商鞅变法中的军功二十爵被认为是秦统一六国的基础。汉承秦制，对王朝的控制不再依赖血缘关系，而是由地缘政治来主导，实行皇权下以郡统县的二级行政制度。

秦始皇谋求建立一个崭新的帝国，在许多方面形成与周天子完全不同的统治方式，他希望昭告天下新的时代来临。

（下转 6 版）